

# 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

李德英 栗薪樾

近年来，三线建设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sup>①</sup>，三线建设时期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也逐渐进入学界同仁的视野，但对于三线建设初期中央、地方、企业等不同层次处理工农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等问题，仍然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sup>②</sup>。实际上，三线建设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处理工农关系，而“厂社结合”模式就是当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界对此问题虽有所提及，但尚无深入的研究，有学者曾提及四川华蓥工农示范区探索“工农结合，城乡结合”<sup>③</sup>，以及四川绵阳“厂社互助，定点支农”的尝试等问题<sup>④</sup>，这或多或少关注到工厂与公社的互动，但仍需进一步探讨；有学者描述了“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过程，但学术层面的思考与分析仍需加强<sup>⑤</sup>；有的文章是笔者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但该文并未对“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推广、效益、困境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sup>⑥</sup>。笔者以为，对“厂社结合”模式的探讨是破解如何认识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以及“工农并举”政策内涵的一把“钥匙”。本文在阅读第一手档案文献和开展口述访谈的基础上，梳理“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考察该模式诞生的历史背景、为工农双方带来的效益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出现的问题，以期从学理层面深刻认识三线建设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 一、“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

“厂社结合”模式是指在三线建设初期的 1965 年至 1966 年间，中共中央西南局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探索出的一套加快三线建设进程、实行工农并举的具体工作方法和措施。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二副主任的阎秀峰指出：“厂社结合就是把工厂附近的公社交给工厂去带，实行以厂为主的厂县双重领导。”“厂社结合”的原则是实行两种所有制、两种分配制度，坚持互利和等价交换，发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精神，促进工农业共同

\* 本文是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7)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关于三线建设的既存研究，参见段娟《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8 年第 2 期。
- ②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小三线建设与城乡关系》（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年），虽然以“小三线建设与城乡关系”为主题，但关于小三线建设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专题论文并不多；陈熙《三线厂与农村的互动关系——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中心》（《二十一世纪》2019 年 2 月号），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切入点，提到三线建设后期三线企业与乡村互动的一些方式，较少涉及三线建设初期出现的工农互动以及工农关系处理模式等问题。
- ③ 王小蓉《略论三线建设在广安的发展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 ④ 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 ⑤ 傅琳、段德强《论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品牌建设——兼论四川广安：中国三线建设精神发源地的演进、构建与启示》，张鸿春主编《三线风云》第 3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49—361 页；傅琳、段德强《再论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品牌建设》，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71—394 页。
- ⑥ 黎明《三线建设与“厂社结合”——以攀枝花特区为中心的考察（1965—1968）》，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8 年。

发展。<sup>①</sup>

“厂社结合”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sup>②</sup>，是该县县委与三线建设项目明光、红光、华光三个光学仪器厂<sup>③</sup>共同合作的结果。为了更好地建设三线，确保国家亟需的建设项目能早日建成投产，西南局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sup>④</sup>的方针，根据国家亟需程度、建设条件等要求，在四川地区12个工业部门中挑选了33个项目作为1965年打歼灭战的重点项目<sup>⑤</sup>。明光仪器厂并未列入1965年“歼灭战计划”，只是一个预备项目，无法获得国家资源的优先支持，只能更多地依靠地方和企业自身能力进行建设。按照计划，明光厂要在1966年上半年建成投产，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明光厂现场党委、指挥部<sup>⑥</sup>提出提前建厂的要求，但承担施工任务的建工部中南三公司不能及时转入明光厂工地施工。<sup>⑦</sup>当时明光厂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等待1965年9月以后正式的建筑队伍施工；二是以少量建筑工人为骨干、民工为基本力量，直接开始施工，但存在“民工没有技术，挖挖土方还可以，盖房子可能不行”的顾虑。明光厂现场党委在反复分析后认为，要保证工厂在1965年建成，等待即会陷入被动，进而提出“鼓足干劲、奋发图强、和敌人抢时间，工作赶前不赶后，要与歼灭战单位并肩前进”的口号。在席卷全国的建设热潮之下，该思路提出后不仅得到了工厂上级的同意和批准，还得到了广安县县委的支持。<sup>⑧</sup>工农结合建厂的思路由此初步形成。

由于缺少专业施工力量，建设人手严重不足，明光厂只好从农村调来970多名“五匠”，即铁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篾匠<sup>⑨</sup>，他们都是长期活跃在农村的手工业者，具有从事乡村建筑的丰富经验，但缺少工业建筑方面的经验。除了直接招收农村工匠外，明光厂还在当地招收民工，将后者分配到从建筑到安装的各个环节，然后采取技工带民工的形式，扩大施工力量，“‘三通一平’阶段，28个技工带974个民工；主体施工阶段，250个技工带954个民工；内部安装阶段，282个技工带971个民工”<sup>⑩</sup>。为了提高建设者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现场指挥部对参与建设的工匠和民工实行“三带”（带思想、带作风、带技术）和“三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管理民主化）管理，使其更快地掌握操作技术，力图在加快工程进度的同时保证质量。

① 《关于试行厂社结合的初步情况和体会——阎秀峰同志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6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6。

② 四川省广安县：1950年隶属川东行政区大竹专区，1953年划入南充专区，1968年改专区为地区，隶属不变。1993年7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广安地区，辖广安县、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代管华蓥市。1998年7月，广安撤地建市，广安县改为广安区，以原广安县所属行政区域为广安区的行政区域。为了避免混淆，本文采用“四川省广安县”的说法。

③ 国营明光仪器厂，代号338厂，是国家在四川省广安华蓥山区布点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隶属第五机械工业部，位于双河公社炼铁厂旧址。国营红光仪器厂，代号348厂，是国家组建的三线军工企业，1965年至1970年7月隶属第五机械工业部，工厂是在四川省广安华蓥山区禄市镇猴儿沟铁厂的旧址上建设起来的。国营华光仪器厂，代号308厂，是在四川广安华蓥山区组建的三线军工企业，1966年至1982年隶属第五机械工业部，位于天池湖畔。参见四川省华蓥市志编纂委员会《华蓥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9、210、211页。

④ 所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是进行基本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对于确定的项目，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不能一下子铺开过多。应当首先上那些当前最迫切的，建设周期长、现上来不及的骨干项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2页。

⑤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2016年印行，第122页。

⑥ 西南三线建委要求“普遍建立由建设、施工、设计等单位 and 地方党委参加组成的现场党委及其领导下的指挥部和政治部，实行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进行联合作战”《一九六五年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六年工作要点》（1966年3月2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8。

⑦ 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33—234页。

⑧ 《西南局转发“三三八厂贯彻工农结合，加快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1965年8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9-04-0522-007。

⑨ 《关于试行厂社结合的初步情况和体会》（1966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6。

⑩ “三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转引自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第376页。

为了争取当地干部和农民对工厂建设的支持，明光厂在职工中进行工业支援农业和工农联盟的教育，开展群众性支援农业的活动，认真贯彻“三不四要”<sup>①</sup>原则，为公社修复电灌站，举办政治文化技术推广站，建立图书室，农忙时节帮助群众抢收抢种等。这些行动不仅优化了厂地关系，还进一步调动了地方民众参与建厂的积极性，例如明光厂附近的公社制订了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四不三要”爱厂护厂公约<sup>②</sup>。广安县委积极推行“四不三要”，广泛进行爱国爱厂教育，抽调力量成立专业小组、确定县委驻厂代表，做好组织、教育工作，保证劳动力和砖瓦沙石等地方材料供应，同时帮助工厂解决住房、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sup>③</sup>。经过各方的积极参与，明光厂于1965年底提前4个月建成投产，节约36万余元投资，占土建投资的15.4%，工程质量获得好评。同时，当地公社农业生产的增幅较大，1965年与1964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32.4%。由于农民参加工厂建设，公社集体和社员的现金收入也增加到平均每人年收入11.5元。因而，建厂单位和地方政府都认为：工农结合建厂，使工农关系、厂社关系越来越密切，工农业相互支援的效果越来越显著。<sup>④</sup>

作为预备项目，明光厂获得的资源远少于“歼灭战计划”项目，需要借助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力量，从农村获取劳动力和建筑物资，虽然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正是这种选择，反而让明光厂创造出“四个当年”的奇迹，即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试生产<sup>⑤</sup>。工农结合建厂的效益让广安县委和三线企业看到了农村的潜力，看到了工农业相互促进，也看到了工厂和公社结合的可能。时任广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石永寿提到“厂社结合，是新形势下的新产物。在实践中，我们经过了一个是否结合——怎样结合——坚决结合的过程。建厂初期，在工厂认真贯彻‘三不四要’，公社认真贯彻‘四不三要’，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工农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我们曾有过厂社是否可以结合起来的想法。”<sup>⑥</sup>很快，这种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成功建厂的协作模式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厂社结合”模式，形成于明光厂的工作实践，也与西南三线建设实际情况以及西南局领导人的设想相契合。检视西南三线建委的报告可见，1965年西南三线建设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放手发动群众，创造了不少建厂经验。例如，重庆浦陵机器厂创造的“三不四要”经验，得到西南局和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将其定为建厂时改善工农关系的原则并全面推广。与此同时，明光厂附近的公社，又提出“四不三要”的护厂原则，这两个原则实际上是工厂和公社相向而行，表达了互相支持和配合的意愿。再如，建设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队伍创造了“既是生产队、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要传思想、教技术、带作风”的经验，体现出三线工矿企业和建设队伍在思想政治层面的

---

① 这是重庆浦陵机器厂创造出来的经验，“三不”指不占或少占良田好土，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的非生产性建筑。“四要”指要支援农业用水，要支援农业用电，要支援农业粪尿，要支援社队抽水。参见《一九六五年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六年工作要点》（1966年3月2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8。

② “四不”指不到工地玩耍，不拿工厂一件东西，不抬高物价，不谈建厂情况。“三要”指要支援工厂建设，要保护工厂不受敌人破坏，要支援工厂蔬菜。参见《西南局转发“三三八厂贯彻工农结合，加快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1965年8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9-04-0522-007。“四不三要”是工农结合的重要经验，推广时其含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变化。“四不”即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打搅现场施工，不拿工地一砖一瓦，不抬高物价。“三要”即要支援国家建设，要保护工厂安全，要增强工农团结。参见《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48页。

③ 傅琳、段德强《再论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品牌建设》，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第377页。

④ 《关于试行厂社结合的初步情况和体会》（1966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6。

⑤ 《中国共产党广安历史》第2卷，第233页。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参见何斌主编《广安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⑥ 《我们是如何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进行厂社结合试点工作的》（1965年12月3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1-693。

作用。<sup>①</sup> 这些经验让西南局对工农结合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关于如何把工业生产建设与农业生产建设结合起来考虑的问题，高层领导在认识上尚未统一。1965年，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提出建立“矿区政府”的设想，即把厂矿附近的一两个公社交给厂矿领导，把工厂和附近农村人民公社相互支援协作的关系固定下来，大厂带大社，小厂带小社，使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厂社结合”的想法由此逐渐清晰。<sup>②</sup>

而当时明光厂创造的工农结合建厂、“厂社结合”经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问题，适逢其时地从实践层面论证了“矿区政府”思路的可行性，进而引起了西南局的高度关注。1965年夏，西南局工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林凌和西南三线建委机械局军工处长孙世安等人到明光厂、华光厂以及所在地双河公社和天池公社蹲点调研，总结“厂社结合”经验<sup>③</sup>。8月，在西南建委和计委会议上，西南局作出了发扬大庆“干打垒”精神、试行“厂社结合”和贯彻小城镇方针的决定<sup>④</sup>。8月4日，西南局转发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工业建设指挥部关于“三三八厂贯彻工农结合，加速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报告，并在按语中再次肯定了明光厂的做法，认为其不仅符合中央工农并举的一贯方针，还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了工程造价，符合勤俭建设方针，所以“值得各建设单位学习参考”<sup>⑤</sup>。

为了进一步推广明光厂的建设经验，9月18日至24日，西南局、五机部、重庆地区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建设指挥部在广安召开“明光建厂现场会”。明光厂党委书记李镜海和指挥部负责人毕国定分别详细介绍了该厂工农并举、技工带民工的经验；广安县委书记、代县长石永寿则介绍地方大力支援重点建设的经验。会议期间，阎秀峰、朱光（时任五机部副部长）、鲁大东（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等领导与会代表前往明光厂和华光厂参观。<sup>⑥</sup> 一时之间，明光厂、华光厂和广安县在西南三线建设工程中声名鹊起。

此次会议不仅是对明光厂的肯定，也极大地鼓舞了地方党委，广安县于会后立即开展“厂社结合”试点工作，与工厂一道在双河公社正式试点。但是，怎样结合还缺乏具体措施<sup>⑦</sup>。10月，李井泉到广安视察，再次肯定了“厂社结合”的工作模式。在上级支持下，广安县决定加快“厂社结合”的推进步伐，“正式宣布双河公社与明光仪器厂、天池公社与华光仪器厂、六（禄）市公社与红光仪器厂实行厂社结合”。<sup>⑧</sup> 此后，“厂社结合”在原则、内容和措施等方面趋于统一，“厂社结合”模式开始形成。

所谓“厂社结合”模式，可以归纳为“一结合”（厂、社结合）、“二并举”（工、农业并举）、“三带”（带政治，带生产、科学技术，带文化）、“四制度”（两种所有制、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

---

① 《一九六五年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六年工作要点》（1966年3月2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8。

② 《杨超同志在四川省计划、基建、物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8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9。

③ 傅琳、段德强《再论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品牌建设》，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第378页。

④ 《关于试行厂社结合的初步情况和体会》（1966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6。

⑤ 《西南局转发“三三八厂贯彻工农结合，加快新厂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情况”》（1965年8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69-04-0522-007。

⑥ 转引自傅琳、段德强《再论三线建设遗产价值的品牌建设》，吕建昌主编《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第379页。

⑦ 《我们是怎样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进行厂社结合试点工作的》（1965年12月3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1-693。

⑧ 《关于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和进行厂社结合试点工作情况汇报》（1966年1月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12。

育制度和两种工资制度)<sup>①</sup>，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的杨超曾总结出更精炼的“八句话”，即“厂社结合，工农并举，两种所有，分别核算，互相支援，等价交换，大庆大寨，共同发展”<sup>②</sup>。这8个词组高度浓缩了“厂社结合”模式的核心精神，便于记忆和宣传。当然，“厂社结合”模式还包括以下一些具体措施：（1）以厂带社，工、农业相互支援，互相促进，特别是要搞好工业对农业的支援。（2）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sup>③</sup>，包括定期轮换工和临时季节工两种形式；同时大力普及初等教育，搞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培养技术后备力量。（3）组织职工家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贯彻小城镇的方针，依托乡场或城镇，厂社合办福利设施。

“厂社结合”模式既是三线建设初期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同时也是多年来中共中央处理工农关系方式的延续。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重心由解决吃穿用向以战备为中心转移的产物，是加强国防建设、防备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讨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曾指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sup>④</sup>在毛泽东的认知中，国防工业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服务，是重中之重；而农业和基础工业则为国防工业服务，同样不可忽视，在备战工作中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在进行规划时，尽管有分歧，但都对农业予以充分重视，强调工农结合<sup>⑤</sup>。例如，李富春认为，“三线建设不仅要搞工业，而且必须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发展农业”；谭震林也提出，“不管东西南北，不管一、二、三线，所有的农村都是第三线”<sup>⑥</sup>；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建设“硬三线”的方针，要把农业基础搞好，粮食做到自给有余<sup>⑦</sup>。在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设想中，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发展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都不能以伤害农业为代价，而且希望通过工业建设带动农业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厂社结合”不仅仅是解决工厂建设的资源紧缺问题，甚至还可以作为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的思路和途径。阎秀峰曾言“对于厂社结合的重大意义，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的。经过井泉同志的不断启发，以后又得到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宝贵指示，特别是井泉同志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后，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使我们认识到，

- 
- ① 西南局建委《关于厂社结合问题的报告（草稿）》（1966年2月2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9。
  - ② 《杨超同志在省委工业交通、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5年12月31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9。
  - ③ 关于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一般认为该制度产生于1958年，由刘少奇提出，目的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过笔者也赞同宋学勤、何成云在《身份与职业：城乡关系视域中的“亦工亦农”（1958—1977）》（《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中的观点，认为亦工亦农制度的产生是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共同努力的结果。三线建设时期，亦工亦农成为广泛推行的一种劳动制度，也成为“厂社结合”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8月，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指出，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相结合，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 ④ 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 ⑤ 不仅是中共中央在思考工农结合的可能，三线建设之初一些厂矿也进行了工农结合的尝试，如1964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防工业办公室编的一份材料中提到河北省建设地方军工厂的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力量”，从公社中抽调了多余劳动力和有修房经验的老农民组织施工队伍，按工房包建，施工高峰时曾达5000人，其中只有300人是从天津、保定调来的专业建筑队伍。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0—332页。本文只是从“厂社结合”的角度分析其诞生的源头，其实从工农结合实践来看，中央和地方、厂矿一直在进行尝试与探讨，广安是三线建设时期“厂社结合”的源头而非工农结合的起源。
  - ⑥ 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9页。
  - ⑦ 1965年11月，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程子华等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到贵州视察。视察结束后，邓小平把中央有关部门和西南各省的负责干部召集到昆明开会。这是邓小平在昆明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参见陈璞如《贵州三线建设琐忆》，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遵义三线建设亲历记》，2013年印行，第7页；贵州省六盘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盘水三线建设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53—54页。

厂社结合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厂社结合可能是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工农业并举、巩固工农联盟、逐步缩小‘三个差别’的具体道路。”<sup>①</sup>可见，西南局对“厂社结合”的认知，不再是某时某地的经验，而是消灭“三个差别”、杜绝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途径。那时“厂社结合”被誉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sup>②</sup>。因此，“厂社结合”在得到理论提升后，已经由经验上升成为一种模式，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并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试点推广。

## 二、“厂社结合”模式的推广及引发的问题

“厂社结合”在工农结合建厂的实践中诞生，得到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认可，在理论上与工农联盟、消灭“三个差别”等思想相结合，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从经验到模式的过程。西南局派人到华蓥山调研“厂社结合”的做法，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文件并推广到各地，同时将文件上报中央<sup>③</sup>。

为了帮助各地各厂矿更好地理解、推广“厂社结合”，西南局以会议的形式展开宣传教育。1965年12月召开为期19天的西南地区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以现场参观、经验交流、小组讨论、座谈等形式，对“厂社结合”、工农并举等问题进行交流学习和思想动员。会议最后几天，李井泉召集领导小组和各组组长传达了毛泽东及党中央关于实行厂社结合、亦工亦农和基本建设队伍实行军事化的指示精神。<sup>④</sup>会后，中共中央批复关于西南试点厂社结合、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报告，“同意西南局选择若干有条件的点，试行厂社结合、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并指示“试点工作，要按期总结，逐步推行”<sup>⑤</sup>。

在西南地区开展“厂社结合”试点的同时，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一九六六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援农业，巩固工农联盟”以及“积极备战，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要求“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各地区、各部门都要选定几个靠近农村的企业，进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试点”。<sup>⑥</sup>

“厂社结合”模式于1966年初在全国各类企业中推广，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里的扩大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推行范围由西南地区扩大到三线地区乃至全国，也是推行领域、数量、内容等多个方面的扩大。从领域来看，“厂社结合”从三线企业扩大到非三线地区的铁道、冶金、煤炭、水电、石油、建工等全国各类企业甚至是街道副业；从数量来看，由最初的明光、华光、红光三个厂扩大到全国成百上千个企业和公社；从内容来看，由工农结合建厂扩大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卫生等多个方面，工作重点也从最初企业和公社之间的经济互动与支持，变成了企业对公社和农民的政治领导与思想教育。

为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厂社结合”试点与推广基本遵循如下程序：首先是召开试点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文件和指示，划定试点单位、讨论相关问题；随后各试点企业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安排参与试点的工作人员并展开工作，在工作中总结经验，及时上报经验总结材料；然后

① 《关于试行厂社结合的初步情况和体会》（1966年2月14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ⅡA0476。

② 李德英、余剑秋对白 WC 的访谈记录（2020年1月5日）。

③ 参见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553页。

④ 《阎秀峰同志在西南地区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要点）》（1965年12月23日），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02-067。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5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8—330页。

根据各地试点情况，选择效果好的单位召开现场会、座谈会，由各单位汇报试点情况，并在交流经验后继续推广。

以贵州省为例，贵州省委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66年1月7日至13日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西南局关于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指示和有关文件，着重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同时学习明光厂、华光厂的经验，“讨论落实了试点工作的领导、划片、定点和其他有关问题。会议确定，1966年进行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44个企业单位，共带38个公社，29个生产大队”。<sup>①</sup>这44个试点单位既有三线建设企业，也有地方企业，分布在冶金、机械、化工、煤炭、建材、轻工、国防、铁路、交通等行业，甚至地质局和物资局系统也安排了几个试点单位带动附近的公社和大队。同时，会议也探讨了城市工厂如何与街道结合、实行轮换工、街道工业和副业发展的问题。会后，贵州省委立即转发会议纪要，将各“厂社结合”的试点单位列于文后，要求各试点企业党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初步打算，指定专人负责，积极行动起来。与此同时，贵州省委还要求各单位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从厂内到厂外广泛展开宣传教育工作，分别召开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会、党团员会、职工大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社员大会，让“厂社结合”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要求不断总结经验，在试点工作中每走一步就要检查总结一次，及时上报经验总结材料到省委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交政治部等有关部门，以便及时介绍和推广。<sup>②</sup>3月20日，贵州省委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小型座谈会，要求各试点企业对前一段试点工作情况、问题和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sup>③</sup>。随后又立即召开厂社结合试点工作座谈会，11个试点单位作了经验报告，会议要求各试点单位拟订出三年或五年的规划，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厂社结合”试点工作<sup>④</sup>。

在贵州省委的积极推动下，各地市州也通过这一工作方式进一步推广“厂社结合”。1966年1月贵州省委开会部署后，都匀市初步传达省委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确定了各试点企业单位所带的公社。1月26日至29日，都匀市委与都匀县委共同召开试点工作会议，讨论试点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要求各试点单位做好规划并总结经验。<sup>⑤</sup>此外，都匀市委决定于3月上旬召开经验交流会，要求“各企业单位对厂社结合工作中的一些点滴经验都要认真加以总结，写成专题材料，整理好一个，报送一个”，同时要求各试点单位指定专人“每十天左右将试点工作情况、经验和问题，用电话或书面和我们联系一次”<sup>⑥</sup>。为了便于各试点单位进行总结，都匀市重点要求思考“如何开展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宣传教育”“厂社如何结合，厂对社如何实现领导”“如何实现三个带动”“如何实行亦工亦农和轮换工制度”“如何保证公社实现两增”“如何搞大庆式工厂，大寨式公社”等问题。<sup>⑦</sup>实际上，都匀市提出的这些思考要点涉及如何平衡工业农业两种发展道路、两种劳动制度、两种学习制度以及如何增产增收等问题，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好这些问题并且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属困难。在多快好省的方针下，都匀市1月份布置工作，3月份总结经验，其间要求每10天

① 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编《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第4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② 《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会议纪要》（1966年1月13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17。

③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小型座谈会的通知》（1966年3月23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17。

④ 《省委召开的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1966年4月1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17。

⑤ 《关于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66年2月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32。

⑥ 《关于召开都匀地区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会议的通知》（1966年2月2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32。

⑦ 《关于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总结提纲》（1966年2月2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32。

汇报一次工作。这种运动式的工作节奏，一方面说明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厂社结合”试点工作，急于了解其成效和问题；另一方面也给各试点单位带来不小压力，使试点单位和公社的干部群众产生了不少顾虑。

从都匀市委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出，工厂企业干部主要有“四怕”：（1）怕带不好公社；（2）怕和农村“四清”运动结合不好，工作队不支持，不能实践“厂社结合”的安排，完不成试点任务；（3）怕兼职多，开会多，没有时间做具体工作；（4）怕搞不好与厂所在地公社的关系，厂社纠纷多。而公社党委书记则有5种思想反映：（1）缺乏大寨自力更生精神，有依赖思想；（2）害怕工厂领导不好公社，有怀疑思想；（3）害怕实行“厂社结合”后，反而增加公社负担；（4）怕“厂社结合”搞不长；（5）认为“厂社是两家人，办工厂是国家的事，搞农业是公社的事”。社员有“三怕”：（1）怕实行“厂社结合”后，家属插队劳动会挤房子、分口粮、占土地、砍山林，影响收入；（2）怕实行厂社合一，一平二调，认为“我们生产的粮食还不够工人老大哥吃的，我们吃什么”；（3）怕青年人都进厂当工人，没有劳动力耕种土地。家属的抵触主要在于插队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身份，职工和家属都怕当农民。<sup>①</sup>

与工厂和公社干部一样，各地不少职工、社员和家属对“厂社结合”也心存疑虑。例如，云南1966年上半年有439个企业同1102个社队进行“厂社结合”试点，“有相当一部分工厂的干部和职工认为工厂兼搞农业是不务正业”，因而对“厂社结合”工作抱消极态度；有些工厂对“厂社结合”有恩赐观点；有些社队有依赖思想<sup>②</sup>。再如，四川成都职工对家属插队震动很大，特别是上海来的家属情绪波动大<sup>③</sup>。同时，亦工亦农轮换工的问题同样在于身份的改变，虽然国家想要缩小工农差别，打破工农界限，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让工人和农民心中“固定工”“铁饭碗”、工人身份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属害怕插队使自己变为农民身份，而农民作为轮换工进厂之后不愿意回到农村，希望能够变为工人身份。“当时城乡之间生产、生活条件差别很大，轮换制的工人一般不愿再回到农村。他们纷纷起来‘造反’，认为实行工人轮换制、合同制是对他们的‘迫害’，要求废除这一制度。”<sup>④</sup>

其实，工厂和公社干部的“怕”并非全无道理，有些顾虑在“厂社结合”实施过程中变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工厂负担过重、“厂社结合”搞不长等；有些顾虑是具体工作中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比如工厂和公社谁当主角、工厂干部如何领导公社等；有的顾虑影响工农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工厂和公社在某些资源分配上的问题。由于“厂社结合”的重心在试点过程中由经济转为政治，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于是几乎所有顾虑都被归结为思想认识问题。例如，都匀市委将工厂和公社干部指出的问题定性为“各种错误思想”，在会上组织到会人员带着问题反复学习钻研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及有关文件，并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用中央指示和文件精神对照思想实际进行检讨。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到会人员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党指出的方向是对头的，路子是正确的，对此不能有丝毫怀疑，那种怕带不好和不相信厂能带好社的看法是错误的”，

① 《关于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6年2月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32。

② 《云南省志·经济综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4页。

③ 《中共四川省委印发“成都市部分企业领导同志讨论西南局建委关于厂社结合报告提出的一些问题”》（1966年3月20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28。

④ 张如兰口述，邹一清整理《20世纪6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调整中的五本“折子戏”》，《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52页。张如兰时任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很多人表示“要坚决挑起这个重担子，打好这场政治仗”。<sup>①</sup>在甘肃省，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党委同样强调大抓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厂社结合”、支援农业意义重大的教育，让职工认识到“厂社结合、以厂带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道路，也是体现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问题”<sup>②</sup>。事实上，干部职工针对“厂社结合”的顾虑始终存在，只是在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深入学习过程中，他们很难提出与主流观点相悖的意见，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厂社结合”试点的各项规定。

在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之下，职工、社员和家属的顾虑主要是从个人角度思考“厂社结合”对于家庭生活、自身利益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和集体诉求远远高于个人诉求，因此这些顾虑往往被视为“错误认识”，是觉悟低的表现，是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借助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和各级党组织的极力支持，“厂社结合”模式仍然被从上到下地强力推广开来。作为一种地方性工作经验，这种模式在短时间内被大范围推广，在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缺陷与矛盾。

### 三、政策与实践的矛盾

“厂社结合”模式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仅表现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下的各种顾虑和抵触，还表现为实践与政策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推广的经验与各地实际情况脱节

“厂社结合”模式在推广过程中，往往照搬明光厂、华光厂以及重庆周边三线企业在试点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措施和办法，然而这些措施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西南地区人地矛盾突出，亦工亦农制度既解除了工厂人力不足的危机，又解决了公社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公社原本就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需要为工厂提供人力资源，只能以完成任务的态度，规定“轮换工的来源，可以考虑采取大体上一个生产队出一个人的办法”进行摊派。<sup>③</sup>

又如东方电机厂在试行“厂社结合”时，试图学习浦陵机器厂在基建中一律采用旱厕积肥支农的经验，但该厂第一生活区宿舍建成于1960年前，按照原设计框架，粪便、污水排到河渠流走，社员仅能提取未被冲掉的很少部分。为此，东方电机厂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实现将全厂的粪便、污水全部用于农田。“我们一方面觉得采用旱厕，既可支农，又可降低基建造价，值得学习；但又觉得，我厂生活区已基本建成，已经是普遍采用了水厕，不便改建，生产区又嫌厂房面积过大，采用旱厕后，工人生产作业时往返不便，为此，我们争论不休。”<sup>④</sup>采用水厕更加便捷卫生，方便职工生活，符合职工利益；采用旱厕能够积累更多的粪肥，有利于农业生产，符合农民利益。

从修建厕所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有时是存在冲突的，如果不妥善处理，非但不能达到工农互利的目的，还会造成工农关系紧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方电机厂决定保留原来的水厕，通过管道将粪便、污水直接排到农田，增添粪便沉淀池和运输车，将沉淀的浓肥机动地分送到各个大队，同时在厂区和生活区均增设一些旱厕，便于就近菜地施肥<sup>⑤</sup>。东方电机厂的处理方式非常巧妙，采取两种具体处理方式解决实际问题。一是保留原有水厕，将化粪池接管延长，直接排到农田，这样既维护了职工利益又方便农业用肥；二是增设旱厕，向上级表明学习浦陵经验

① 《关于召开厂社结合，以厂带社试点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6年2月6日），贵州省都匀市档案史志馆藏，档案号1-1-32。

② 《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试行厂社结合》（1966年2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4-002-0765-0005。

③ 《中央西北局批转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6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3-003-0768-0028。

④ 转引自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下），2015年印行，第143页。

⑤ 转引自《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下），第143页。

的态度。东方电机厂的做法既突出政治正确，表明支持工农业并举的决心，同时又真正解决了实际问题，化解了矛盾，体现了兼顾政策与实际、工与农、公与私的智慧。

从政策的推广与接受角度来看，“厂社结合”推广后能够收到多大成效，取决于接受者的智慧。接受者需要在充分理解政策真实意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活学活用、合理设计实施方案。如果接受者没有理解政策背后的真实含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平衡各种关系，盲目照搬，那么“厂社结合”推广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会十分有限。

## （二）部分政策措施无法真正贯彻执行

“厂社结合”某些措施涉及多方利益，无法真正执行或长期贯彻。例如家属插队问题，据天池、双河“厂社结合”试点工作组报告，职工家属插队有3种形式：（1）家属组织起来为工厂服务，这种形式家属比较愿意；（2）插厂挂社，如明光厂宣布9人当社员，宣布后1人到小学教书，另外8人其实并未在公社插队，而是到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向生产队交公积金2元；（3）真正地插队当社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厂社结合”的发源地明光、华光两厂实际上都未实施，也没有实施过家属插队政策<sup>①</sup>。目前，笔者仅在材料中看到家属插队的规定和实践，但在采访多地不同企业职工的过程中，尚未发现有家属插队的情况，甚至大部分人从未听过这种说法，表示不理解家属为何会与插队产生联系<sup>②</sup>。从个人实际诉求来看，职工家属到公社插队，不仅不符合职工和家属利益，也不符合公社社员利益。在大部分人心生抵触的情况下，家属插队难以得到广泛推广。

此外，亦工亦农轮换工在某些厂矿也未真正“轮换”起来。例如，华光厂招收多批轮换工后，除“下放了一批”以外，没有出现轮换回农村又在农村重新招人进厂的现象，而且大概1972年以后所有的轮换工都转正了<sup>③</sup>。华光厂所在地天池公社副书记也提到，轮换工进厂之后粮食、户口关系已经全部转到工厂，为公社解决了剩余劳动力，减轻了负担，而且天池公社输送到华光厂的轮换工没有一个轮换回农村<sup>④</sup>。实践证明轮换方式让企业无法获得稳定的技术工人，所以后来国家有了新政策，让轮换工转正<sup>⑤</sup>。国家希望通过轮换工政策打破“只能进不能出”的用人制度，以低工资的形式缩小城乡差别，但是轮换工制度需要企业花费大量时间不断培养新工人，耗时费力，因此工厂不愿意让技术娴熟的轮换工回农村；公社通过轮换工制度减轻了口粮负担，对轮换工是否回乡并不关心；而且“厂社结合”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本身实行时间不长<sup>⑥</sup>，没有达到3年至5年的轮换周期，所以实际造成轮换工并未“轮换”的情况。同时，国家希望以轮换工作为工厂和公社之间的桥梁也难以实现，轮换工进厂后的自我认同大多是“工人”，与所在社队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和谐。攀钢职工提到“我们拿28块钱一个月，还得生产队抽2块钱做啥子公益金，我们当时都是（亦工亦农轮换）合同工，最后才转了正的，转正过后就不扣那2块钱了。”<sup>⑦</sup>20多元的工资在当时维持生活都很困难，还要给公社交公益金，轮换工心里是不太愿意的<sup>⑧</sup>。可见，亦工亦

① 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广安卷》（上），2018年印行，第250页；粟薪樾、傅冠雄对唐DL等人的访谈记录（2020年1月15日）。

② 家属插队主要针对农村来的职工家属。虽然在采访中未曾发现家属插队的情况，但在材料中发现某些地区和厂矿曾有农村家属和少量城市家属插队到当地社队。

③ 李德英、粟薪樾对陈DY的访谈记录（2020年1月15日）。

④ 李德英、粟薪樾对祝LX的访谈记录（2020年7月30日）。

⑤ 李德英、粟薪樾对蒙Q的访谈记录（2018年10月22日）。

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厂社结合”受到冲击，参与该工作的企业和地方干部有不少被揪斗和批判。同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厂社结合”一词在1966年下半年后的文件中鲜有提及，但工农互相支持的一些措施被保留下来，如支农活动、供水供电等。

⑦ 王华等对王TX访谈记录（2018年7月3日）。

⑧ 李德英、粟薪樾对陈DY的访谈记录（2020年1月15日）。

农轮换在实践层面也未完全实施。

另外，关于工厂是否修围墙的问题，当时争议较大。据参加过广安试点工作的林凌回忆：“工厂要建围墙是天经地义的事，三线建设的厂子建在大山里头，很分散，建围墙需要花很多钱。能不能不建围墙，工厂由周围公社的农民群众来保护？搞一个厂社结合？”工厂领导和县区领导、公社领导讨论后认为，“只要做好周边农民的工作，使农民把工厂也当作自己的家，就可以不修围墙”。明光、华光两厂最初并没有修围墙，节约了成本，“那时厂内外政治氛围很好，工厂的东西虽有些小的丢失，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但时间长了就不行，后来还是修了围墙”。<sup>①</sup>在建厂之初，不修围墙看起来是节约建筑成本的好方法，通过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较好的保卫工厂的效果。但是，三线厂矿作为国防企业，有保密需求，从长远来看需要围墙来保护工厂财物和信息安全。

由此看来，在上级决策与实际需要产生冲突时，通过思想教育，人们虽然接受了“厂社结合”的一些原则和措施，但在实践过程中，工厂还是会考虑自身发展与职工诉求，通过各种方式调整上级政策中的某些具体规定。

### （三）政治意义与实践效果无法统一

“厂社结合”的政治意义被上升到路线方针问题之后，工业支援农业成为硬性任务，是一种拥护中央政策的态度，工厂被要求“主动大力支援农业，凡是工厂能够办而且应该办的事，要坚决主动去办”<sup>②</sup>，造成了农业依赖工业、工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与“厂社结合”坚持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相矛盾。由于西南三线建委和中央的大力推行，“厂社结合”成为工农结合的一面旗帜，干部群众很难公开反对这种做法，只能从进一步完善新生事物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四川省永川地区花果山煤矿在“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口号下，实行“厂社结合”：煤矿要从人力、物力、技术以及政治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扶持公社；公社则从农副产品和临时劳动力的提供方面支持煤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厂社结合”暴露出许多问题，花果山煤矿迫于形势，不敢提出意见，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曾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办公室主任的王春才这样描述“四川省工交会议上已介绍过这种做法，在西南三线建委会议上进行过交流，如今是名声在外，骑虎难下。在那个只报喜不报忧的年月，谁又胆敢出面‘砍旗’？”时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彭德怀到花果山煤矿视察，煤矿领导在汇报问题时，也是从肯定新生事物、肯定成绩的角度谈起，而并未全面反映煤矿在“工农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尽管如此，一向耿直的彭德怀听完汇报后指出“从长远来看，以工带农，互相促进，缩小了工农与城乡差别。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但工农不能相互依赖，不能吃大锅饭，要各自在发展生产上下功夫。”<sup>③</sup>

其实，农业对工业的依赖，既受主观因素影响，在客观上也与公社难以获得充足的全国统一调配物资、需要工厂支援有关，但工厂的生产建设同样离不开这些物资。东方电机厂即指出，工业基建所用的水泥，大量拿出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是有问题的。在支援公社筑堤防洪的过程中，“我们又不能眼看着施工现场因没有水泥而半途停下工来，待洪水一到，社员们付出的几十万个劳动日白白被浪费”。<sup>④</sup>实际上，东方电机厂遇到的问题根源，在于“厂社结合”与当时的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物资供应体系之下，工厂的自主权有限，难以做到以工厂资源解决公社遇到的所有问题。

<sup>①</sup> 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553页。

<sup>②</sup> 《刘焯同志关于厂社结合试点工作的发言》（1966年），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0-001-0087-0011。

<sup>③</sup> 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

<sup>④</sup> 《三线建设在四川·德阳卷》（下），第145页。

这些政策措施和实践的矛盾，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息息相关，不是将工厂和公社结合在一起，让工厂承担更多公社甚至地方政府的责任就能解决的，因此，无论如何试点和推广，时间一长，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工农并举并非易事。因此，推广不到两年的时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厂社结合”的模式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中国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试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相继建立了统购统销、户籍管理和人民公社制度。这些制度在限制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同时，也使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进一步拓展和强化，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让工厂布局在广大农村，成为打破城乡之间这道鸿沟的尝试。“厂社结合”模式的诞生更是将工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试图实现工农业并举的局面。然而，在“厂社结合”试点的同时，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供给，原有的制度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使“工”与“农”之间这道鸿沟始终难以突破。被招收为轮换工的华光厂职工遇到了办户口手续的困难，跑了好几次才办下来<sup>①</sup>。当时的工人与农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收入、医疗、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通过“厂社结合”模式打破工农之间的界限往往收效甚微。

除了城乡二元结构之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供应体系也不利于“厂社结合”工作的开展。三线建设项目多、时间紧，物资供应常常供不应求。工厂得到的资源本就有限，而公社更难以获得国家、省（部）统一调配的各类物资，公社在某些时候需要依赖工厂的支援，工厂有时候不得不拿出部分物资支援公社，这虽然体现了工农互相协作的精神，但工厂的负担和压力越来越重，对公社的某些支持也不能真正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逐渐形成一个非良性循环的局面。要达到消灭“三个差别”的目的，不是仅仅依靠“厂社结合”即可实现，还需要整个国家机制的调整和改变。

“厂社结合”作为一种新的模式，需要在试点过程中找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邓小平在“厂社结合”模式推广之初就指出“要搞试点，路摸清了再走。搞不好，实际上就把全民所有的财产拿出去了。”<sup>②</sup>西南局一开始也提出“厂社结合，是个新事物，我们还缺乏经验，必须不断实践，总结经验，逐步充实、提高。”<sup>③</sup>可是，在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下，“厂社结合”模式推广速度过快，很多总结和报告流于形式，报喜不报忧，大谈“厂社结合”的成效，对于遇到的问题一带而过，甚至避而不谈。在这样的风气下，“厂社结合”模式失去了自我完善和修复的时间，直接被当作模板和标杆推广到全国，造成政策与实践脱节，自然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实施效果。不过，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森严的时代，作为一种试图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重要尝试，“厂社结合”模式这一历史途径依然值得学界进一步的关注与研究。

（本文作者 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粟薪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薛 承）

<sup>①</sup> 粟薪樾、傅冠雄对彭 CX 的访谈记录（2020年1月15日）。

<sup>②</sup>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8页。

<sup>③</sup> 《一九六五年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六年工作要点》（1966年3月29日），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档案馆藏，档案号012-04-008。